

马克思与阿伦特审视“犹太人问题”理论视角差异

罗二红^{*}

【摘要】马克思和阿伦特在研究“犹太人问题”时虽然有着不同的角度和重点,但却存在一定的思想联系。他们将“犹太人问题”置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关注犹太人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和政治限制。马克思着重于资本主义社会对犹太人地位的影响,而阿伦特更注重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在民主国家中的处境。尽管两人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不同,但都试图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角度理解“犹太人问题”,本文将探讨两人在解决这一复杂社会议题上的异同。

【关键词】马克思;阿伦特;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问题”本质上是民族的生存问题,其表征复杂而多层次,涉及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它通常指的是对犹太人在生活历史上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歧视、迫害和排斥现象的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事件,包括犹太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地位、法律限制、宗教迫害、种族歧视、大屠杀等。“犹太人问题”的研究对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对抗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吸引着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马克思和阿伦特作为两位杰出的社会思想家,都对“犹太人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他们的研究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马克思在 19 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对“犹太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将“犹太人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认为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是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导致的。马克思的研究强调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面临的社会排斥和政治限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则在 20 世纪对“犹太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的研究更加关注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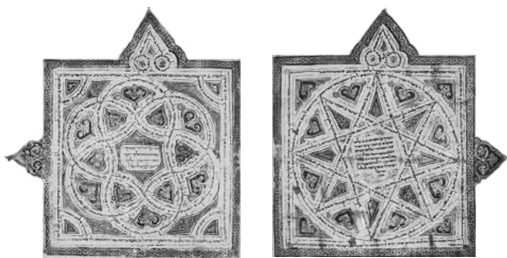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 罗二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太人在现代国家和政治体制下的处境。阿伦特认为,“犹太人问题”不仅是一个种族或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在生存和生活思考基础上的政治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犹太人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

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批判揭露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问题,这种观点在他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①中得到了表达,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下,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显著存在。他认为,由于犹太人在这些领域中的活动频繁,他们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代表性角色。然而,这种经济角色也使得犹太人成为社会的排斥对象,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利用金融手段谋取私利的象征。例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犹太人在马克思的笔下被描绘为自私自利的象征,他将自私自利与“犹太精神”相联系并进行了解读。根据马克思原文,犹太人只不过是“市民社会成员”的代表,因此,“犹太人问题”在他的文章中实际上指向了与“市民社会成员”相关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对此,罗恩·费尔德曼(Ron H. Feldman)指出:“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处于时代发展的前沿,因为犹太人所体现的特征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化问题的信号。因此,正是通过犹太人,马克思首次发现了金钱成为‘当代普遍的反社会因素’,即‘最高的实际表达人类自我疏离状态’,导致‘公民社会将自己与国家生活完全分离,切断了人类所有物种的纽带,并将人类世界溶化为一个原子主义、对立的个体世界’。马克思后来将货币本身的反社会因素与由此产生的商品拜物教联系起来,这一社会关系被他界定为商品拜物教,同时他的研究重心从犹太人转移到了资产阶级。这并非偶然,因为犹太人——至多——是原始资本家。作为商人、金融家和放债人,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他们比其他任何群体更多地涉足远离土地和货币经济的领域。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犹太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经济部分的社会和经济存在预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犹太商人和金融资本只是资本主义阶级的寄生部门,他们从工人手中获取一部分剩

^① 除了《论犹太人问题》之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中再次提到“犹太人问题”,但主要是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和“犹太人问题”理论上无关。《德法年鉴》之后马克思就不再讨论“犹太人问题”,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不再关注“犹太人问题”,但是在后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有着犹太人的影子。因此,从文本上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之后,就没有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本了,但是从思想关联上看,马克思将犹太人视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参见 David McLellan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Karl Marx],王珍 Wang Zhen 译(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6),77—83。



余价值。因此,当马克思通过对犹太人的思考首次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所在,并认为这一秘密首先在犹太人发展起来时,他认为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唯物辩证法中并没有独特的地位,因为这种辩证法将所有人都转变为资本家或工人。”^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思考的另一个维度是对犹太人与金钱货币之间关系的思考,马克思将其称为“人的异化”。在他看来,金钱成为犹太人崇拜的神,一切都以金钱为中心,政治活动也成为金钱的附庸。马克思明确指出:“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②金钱的异化控制人使人成为物的奴隶,“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③。马克思将犹太人利用“金钱”操控“政治”的问题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④。基于此,当“马克思把对犹太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批判结合在一起”^⑤时,我们不难理解“金钱,正是金钱令犹太精神渗透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⑥。总而言之,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先兆。犹太人不仅代表着一个民族,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不仅是犹太人的自私自利,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他警示称,资本主义社会在金钱的腐蚀下可能走向自私自利、个体化的社会,从而阻碍市民社会成员实现“政治解放”及随之而来的“人的解放”。

① Werner J. Dannhauser, “The Jew as Pariah, by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Ron H. Feldman (Book Review),” *Commentary* 67 (Jan 1979): 70.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51。

③ 同上,94—95。

④ 同上,52。

⑤ 张倩红 Zhang Qianhong,《〈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An Analysis of Marx's Views on Jews from “On the Jewish Question”],于《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2004年第6期[2004, Issue 6]。

⑥ 刘同舫 Liu Tongfang 等,《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研究》[A Study of Young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8),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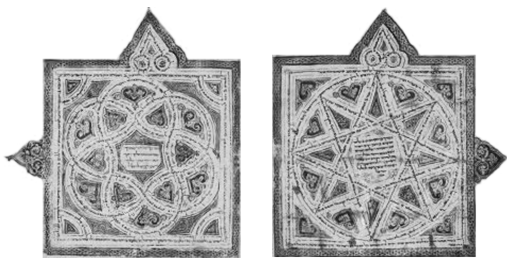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二、阿伦特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探析 20 世纪“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思考

阿伦特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 1933 年德国爆发了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这就促使阿伦特转变为对“犹太人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她查阅了马克思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例如,她在文中指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论著是人所共知的”^①。另一方面,阿伦特对马克思及其理论的认知主要受到其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②的影响。由于布吕歇尔曾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的观点对阿伦特的政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阿伦特的传记中记载了布吕歇尔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阿伦特的影响,她写道:“以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又译作布吕赫)为师,阿伦特为她对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大部分阅读增加了一种‘革命实践’的感觉。……她概括了布吕赫在学术上对她的影响:‘我从我丈夫的政治思考和历史观察中学习,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做到这样,因为我在历史和政治上被导向了犹太人问题。’”^③阿伦特早期对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围绕“犹太人问题”中的反犹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问题展开。尽管此时阿伦特的关注点不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上,但她在分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多次引用并注解了马克思及共产主义的观点,以论证近代反犹主义的兴起及理论。此外,在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分的帝国主义时,阿伦特借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方面日本学者川崎修认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著作中潜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写道:“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隐藏在阿伦特观念背后作为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这种说法也许会让人甚感意外。这是因为,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所论述的都不是最

①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林骧华 Lin Xianghua 译(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7),90。

② 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其名字全称为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布吕赫(Heinrich Friedrich Ernst Blücher)。布吕赫先后参加过斯巴达主义团体及德国共产党。布吕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的政治理论深受马克思、恩格斯及托洛茨基的影响,后期他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极为失望,加入了阿伦特所说的“原共产主义”(former Communist)。1936 年,布吕赫认识阿伦特,1940 年 1 月 16 日两人在巴黎结婚,1941 年两人从法国经由葡萄牙坐船移民至美国。战后深受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影响,未能获得美国国籍,直到 1954 年获得美国国籍,后期在美国里德学院任教,被聘任为里德学院哲学教授,1970 年病逝于美国。

③ Elisabeth Young-Bruehl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陈伟 Chen Wei、张新刚 Zhang Xingang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7),134—135。



终决定论,实际上,它对从经济方面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的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此外,阿伦特在其他文章(如《帝国主义论》《作为贱民的犹太人》等)中,也明确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但是,把帝国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逻辑归结,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的帝国主义论,其实就是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给予了某种补充。”^①阿伦特曾在《历史的道德》(“The Moral of History”)中高度赞扬了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合理性:“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写了《资本论》,一本狂热追求正义的书,比‘族群中被选中的人’(chosen man of the chosen race)更有效地继承了犹太传统。”^②“马克思的《资本论》起初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且,在第二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到,辩证的方法,同时也是‘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马克思知道他在做什么。”^③

当然如果将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与阿伦特的“犹太人问题”研究联系起来,可以发现阿伦特对20世纪“犹太人问题”的探讨是对后资本主义时代问题的延续思考。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导致西方传统政治结构的衰退现象。阿伦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马克思是最早发现产业革命中各种问题的人。”^④她写道:“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自18世纪政治革命和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已经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总体平衡,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发生的事情。”^⑤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其核心是由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延续到20世纪,并对20世纪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帝国主义扩张、反犹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问题的批判也是阿伦特继续关注的问题。因此,阿伦特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联系起来思考:“只要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今天依然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今天,马克思对世界几乎

① Kawasaki Osamu 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Arendt: The Reclamation of Publicness],斯日 Si Ri 译(石家庄[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Education Press],2001),5。

② 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eds. Jerome Kohn and Ron H. Feldma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315。

③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罗纳德·贝纳尔 Ronald Beiner 编,曹明 Cao Ming、苏婉儿 Su Waner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7),56。

④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Karl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孙传钊 Sun Chuanzhao 译(南京[Nanjing]:凤凰出版社[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12),7。

⑤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301—30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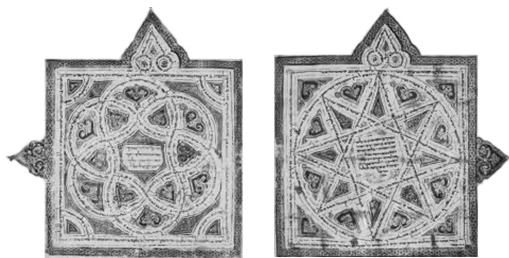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所有领域仍然有着巨大影响,这是一个明证。”^①阿伦特与马克思共同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产生重大分歧,反而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阿伦特的学生伊丽莎白·扬-布鲁尔指出:“很多人都忽略了阿伦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也会带来不幸和普遍贫困的区域——正如美国自身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正发生的那样‘经济增长有一天可能变成诅咒而非善果,它绝无可能引向自由或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据’。”^②因此,菲利普·汉森(Phillip Hansen)指出:“阿伦特的著作背后‘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③阿伦特关于政治行动重要性的观点,以及她关于行动、自由和政治原因的看法,实际上与马克思的观点更接近。在阿伦特的“犹太人问题”研究中,20世纪犹太人遭受屠杀的事实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明显政治问题。

深入探究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我们会发现,她的“犹太人问题”研究是其后期政治理论形成的重要源泉。尽管在艾希曼审判之后,阿伦特很少直接谈论“犹太人问题”,但通过研究她的著作,如《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康德的政治哲学讲稿》《政治的应许》《责任与判断》等,我们可以发现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关于犹太人的“非政治性”特征与近代人类社会的“无世界性”以及“世界异化”(worldly alienation)之间的思想关联。以《人的境况》为例,虽然表面上它并非“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文本,但通过对其中的政治理念进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着犹太人“非政治性”的影子。学术界从两个方面分析《人的境况》与“犹太人问题”的关联。一方面,通过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人们可以看到对人类政治生存处境的先兆。学者玛丽·G.迪茨(Mary G. Dietz)在《阿伦特与大屠杀》中认为,《人的境况》揭示了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思考成果。她指出:“只有我们理解了《人的境况》中那个被‘刻意排除’的现象的特性,我们才能明白阿伦特关于作为‘展示空间’的政治公共领域概念的深度与复杂性。那个现象,就是阿伦特认为开启了通往大屠杀这一极权主义之恶的极端形式的‘地狱实验’:纳粹党卫军集中营,在那里,整个对于犹太民族的清洗与灭绝计划在进行,反人类罪在发生。《人的境况》的一大部分正是针对这一地狱实验,阿伦特发明的‘展示空间’概念正是其反题。当然,这一努力并非直接的,

①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9。

②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6—17。

③ Phillip Hansen 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Hannah Arendt: Politics, History and Citizenship],刘佳林 Liu Jialin 译(江苏[Jiangsu]:江苏人民出版社[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1。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阿伦特的文本中看到她最终怎样巧妙而隐微地应对这一人造地狱带来的恐怖。”^①另一方面,通过犹太人对政治的漠视态度,我们可以分析现代社会政治已经被经济发展瓦解的现象。达纳·维拉(Dana R. Villa)指出:“任何一个少数人团体如果从公民生活中撤离,或者接受了多数强加给他们的政治排斥,则可能失去的不仅仅是公民权利,而是一切。这种命运就发生在欧洲犹太人的身上。”^②尽管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没有直接谈论犹太人的“非政治性”,但她提出的“非世界性”与“世界异化”两个政治概念对此有所暗示。在《人的境况》以及《过去与未来之间》中,阿伦特解释了“非世界性”是一种政治现象,表现为政治世界的非延续性与断绝性特征,即人类政治空间遭受的破坏情形。而“世界异化”则指人类在科技发展条件下,研究范围已超越地球而进入宇宙领域的探索,导致人类逐渐脱离自身生存的世界,与世界形成一种疏离状态,生活在一个“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的政治状态。通过分析犹太人的“非政治性”给犹太人带来的灾难,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人类政治中,人类可能因陷入“无世界性”和“世界异化”而面临毁灭危险:阿伦特特别提到核战争以及现代经济发展导致的人类毁灭危险。因此,阿伦特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警示我们20世纪之后的人类政治可能走向毁灭:“在我们20世纪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可能从政治中产生的更大的灾难。”^③“犹太人问题”只是阿伦特对后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开端,其本质是透过该问题展现人类政治潜在的危机。阿伦特曾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序言中写道:“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残暴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是一种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这很不重要的)现象,但是反犹主义却成为先是纳粹运动,接着是世界大战,最后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触发原因。”^④

三、马克思与阿伦特在理论上解决“犹太人问题”探究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出了两个关键步骤来解决“犹太人问题”:首先是“政治解放”,其次是“人的解放”。前者是马克思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政治

① Dana Villa 达纳·维拉编,《剑桥阿伦特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陈伟 Chen Wei、张笑宇 Zhang Xiaoyu 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 Press],2018),99。

② 同上,6。

③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The Promise of Politics],杰罗姆·科恩 Jerome Kohn 编,张琳 Zhang Lin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7),103。

④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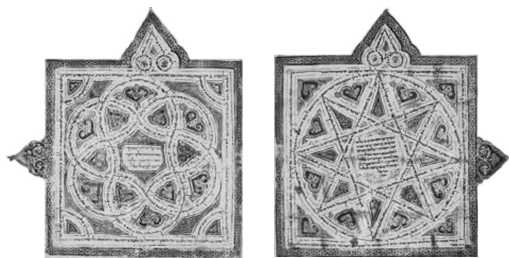
第23辑

前提,而后者则被视为解决问题的终极办法。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有所区别。阿伦特认为,既然“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解决它也需要从政治层面上寻找办法。比较马克思和阿伦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两者都从政治的角度探讨了问题的根源以及犹太人在政治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弊端。然而,在提出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时,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倾向于实现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人的解放”,而阿伦特则更倾向于“复归古希腊罗马式的民主政治生活”^①。比较马克思和阿伦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观点需要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包括他们对问题根源的认识、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及方法论上的差异等。

首先,马克思主张的解决方案聚焦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改变。他认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剥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导致了犹太人和其他群体的社会排斥和经济压迫,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消除私有制和阶级差别。马克思的思想反映了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强调,他认为只有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制度,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马克思着眼于未来人类进入一个大团结的无产阶级社会,将犹太人视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并通过解决整体性问题来实现部分问题的自我解决。对此,刘增明指出:“马克思认为只有以‘社会力量’对抗‘政治力量’,才能实现人的解放,而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形式只能是共产主义。从而,《论犹太人问题》已经为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做了良好的铺垫,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明无产阶级只有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人的解放获得现实性,从而也才能为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真正统一,提供现实的道路。”^②相比之下,阿伦特更关注文化认同和政治权力的问题。她认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的文化异化和政治排斥。阿伦特主张犹太人应当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并重建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权力,以摆脱历史上的压迫和排斥。她强调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因素对“犹太人问题”的影响,认为只有通过重新获得政治自主权和文化认同,犹太人才能真正摆脱历史上的困境。例如,阿伦特在谈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方案时,她所赞同的“基布兹运动”以及“伊休夫运动”就类似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体。所以她

① 白刚 Bai Gang,《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Two Paths beyond Modernity: Marx and Arendt],于《人文杂志》[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2013年第1期[2013, Issue 1]。

② 刘增明 Liu Zengming,《论马克思对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的批判和重构——从《论犹太人问题》的文本解读来看》[Marx's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Life and Public Life: An Interpretation of "On the Jewish Question"] ,于《哲学动态》[Philosophical Trends],2009年第3期[2009, Issue 3]。



倡导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阿拉伯—以色列双民族的国家联盟。在《拯救犹太家园》中,阿伦特建议:“地方自治和尽可能多的犹太—阿拉伯市政和农村混合委员会(mixed Jewish-Arab municipal and councils),是最终能够导致巴勒斯坦政治解放的唯一现实政治措施。”^①

其次,两位思想家的解决方案存在一些共通之处。马克思和阿伦特都认为“犹太人问题”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根本性的改变来解决。他们都强调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对犹太人的影响,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只有通过改变社会结构和积极参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例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阿伦特指出,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无阶级和无国家的社会似乎实现了古代摆脱劳动之闲暇的一般条件,同时也实现了摆脱政治的闲暇。她认为政治的前提是自由,而要获得自由就需要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阿伦特指出“只有拥有闲暇时间的雅典人才是雅典公民,他们拥有不劳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社会才能实现的”,所以“当我们能深入考察马克思理想社会的实际情形,他的理想社会与雅典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就得更令人震惊了”。^②如果说人依然受制于劳动的束缚,那么政治自由就无从谈起。“只有在物质之上必需与身体之上之野蛮武力终结之处,政治方才开始存在。”^③关于这一论断,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分析“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起源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及奥古斯丁的“实践的生活”(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相关,并论述“政治”与“自由”之间的关联。“自由”是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自由,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④这也切合了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

最后,两位思想家的方法论存在一些差异。马克思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结构,他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和压迫。相比之下,阿伦特则更强调政治行动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她主张通过建立犹太人国家和重建文化认同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强调了个体和群

^① 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401.

^② 参见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15。

^③ 同上,111。

^④ 参见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王寅丽 Wang Yinli 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8),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体的政治责任和行动的重要性。这一点尤其归因于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受限。一方面,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导致其后期淡出了“犹太人问题”。1951年,阿伦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件中指出,马克思理论的重心在于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商品经济将人和自然去自然化”现象,因而后期马克思很少再讨论“犹太人问题”。^①另一方面,阿伦特指出了马克思在研究“犹太人问题”时的缺失,特别是忽视了犹太人的政治问题,这限制了他对国家结构和犹太人角色的进一步“监视”。在阿伦特看来,“政治”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而言有所欠缺。例如,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的理解上是一种被动形式而非主动形式,“政治只不过是社会的功能,活动、谈话(speech)和思维原本是社会利益的上层建筑——这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马克思从近代经济学家们那里毫无批判地接受的若干公理性假设之一”^②。阿伦特的分析并未完全否定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而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阿伦特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继续再思考,是在马克思批判犹太人社会层面的基础下,发展马克思所没有提及犹太人的政治问题。”^③因此,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解放”解决“犹太人问题”会有破坏人类政治活动的嫌疑。在《论革命》中,阿伦特分析马克思的革命观时指出,“马克思沉迷于社会问题,不愿认真关注国家和政府问题来加以解释”^④。这归咎于马克思以“人的解放”为基础形成的“社会领域”不仅破坏政治空间的“私人领域”,同时也破坏了政治的“公共领域”。“当马克思宣布哲学及其真理不是处在人群事务及他们的共同世界之外,而是恰恰就处在人群事务及共同世界当中,并且只有在共同生活的领域中‘实现’[他将该领域称为‘社会’,基于‘社会化的人’(vergesellschaftete Menschen)的出现而存在]的时候,政治思想传统就到达了它的终点。”^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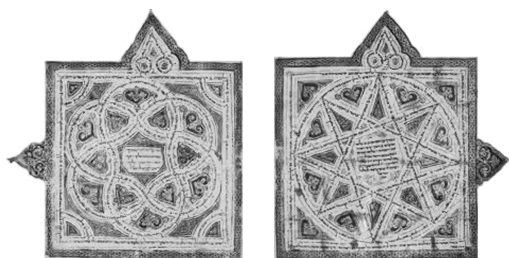
① 参见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11。

②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23.

③ 陈伟认为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虽然没有正视“犹太人问题”,但是马克思倡导的反抗被压迫的意识对“犹太人问题”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他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犹太人问题上的见解,从阿伦特的立场来说,它仍然没有正视犹太人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反抗行动,对犹太人问题之解决仍具有重要意义。”陈伟 Chen Wei,《阿伦特与犹太人问题》[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第8辑[Secular Age and Transcendent Spirit(8)],许纪霖 Xu Jilin 主编(江苏[Jiangsu]:江苏人民出版社[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223。

④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On Revolution],陈周旺 Chen Zhouwang 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 Press],2017),242。

⑤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王寅丽 Wang Yinli、张立立 Zhang Lili 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 Press],2018),13。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阿伦特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观点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都认为“犹太人问题”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根本性的改变来解决。马克思更强调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而阿伦特则更注重文化认同和政治权力的重建。他们的思想为我们理解“犹太人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框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借鉴。

结 论

“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历经古今、复杂多变的议题,涉及历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多个层面。从马克思到阿伦特,两位杰出的社会思想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他们的关注点和方法有所不同。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强调了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和政治限制。而阿伦特则更加关注犹太人在现代国家和政治体制下的处境,认为“犹太人问题”不仅是一个种族或宗教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两位思想家都试图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角度理解“犹太人问题”,并探讨如何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议题。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一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犹太人问题”远未结束,仍然存在于当今社会。种族主义、仇恨犯罪以及政治排斥等问题依然困扰着犹太社群。从激增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到针对犹太人社区的暴力袭击,这些事件提醒着我们,历史上的伤痛并没有被遗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在探讨“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反思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上,“犹太人问题”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人类社会对于少数群体的歧视和迫害的一个缩影。因此,解决“犹太人问题”并不仅仅关乎犹太社群本身,更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通过对马克思与阿伦特的“犹太人问题”深入研究和持续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智慧,以期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谐、文明的世界。